

战争回忆录

第三卷

拯 救

1944—1946

戴高乐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战争回忆录

第三卷

拯 救

1944—1946

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年·北京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LE SALUT

1944—1946

Librairie Plon, Paris, 1959

根据巴黎普隆图书公司 1959 年法文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战争回忆录

第三卷

拯 救

1944—1946

〔法〕戴高乐著

北京翻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四)精 3.0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1 $\frac{1}{8}$ · 插页 5 · 字数 507,000

1964 年 11 月第一版 1964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37

出版者說明

本卷从1944年8月戴高乐回到巴黎写起，到1946年1月他被迫下台为止。这一时期正是希特勒德国从继续节节败退到无条件投降，美英法等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上来，同时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激化的时期。戴高乐从他自己和法国的角度出发，在本卷中描述了这方面的主要问题。书中的描述对于研究战后欧洲形势，特别是法国形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戴高乐回到巴黎后，在国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内地军和爱国民兵已经成长为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很多地方的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抵抗运动组织的手中，甚至有不少地方处于武装起义的前夕。戴高乐在本卷中毫不隐讳地说明了他如何迅速地整编内地军和解散爱国民兵，如何对付法共和把地方政权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谈到这些问题时，书中还论述了当时法共在国内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在国际上，当时戴高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法国如何排除美英的阻挠而恢复大国地位，如何把英美势力从法国的殖民地和托管地赶出去。本卷对戴高乐在对德最后战役中设法扩大法军的战果以争取在对德问题上的平等发言权，对戴高乐分别同英美苏政府首脑谈判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对法英在中近东地区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作了详尽的叙述。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考，本卷的绝大多数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均照第一、二卷的译法。正文中许多同附录有关的部分，原文不一致，译文也各按原文译出。地图仍照原图制版，未作更动。

1964年6月

目 录

解放·····	1
地位·····	41
秩序·····	88
胜利·····	125
不和·····	174
分裂·····	224
卸任·····	260

文 件

解放·····	281
地位·····	342
秩序·····	403
胜利·····	472
不和·····	509
分裂·····	584
卸任·····	637

解 放

解放的步伐极其迅速。盟軍和法軍在阿沃朗斯打开缺口并在我国南方登陆以后，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時間就到达安特卫普，进駐洛林，冲入孚日山区。9月底，除阿尔薩斯及其前进陣地、阿尔卑斯各山口和大西洋沿岸的据点以外，我国全部領土上的敌人均已肃清。由于盟軍机械化部队的打击和法国抵抗运动的到处襲击，德軍在比不久前侵占我国領土的速度短得多的時間內就被驅逐出去了。敌人只能在沒有民众起义来扰乱其后方的德国边境重新站定。但是，潮水退下去以后，法国創伤的痕迹突然完全显露出来。

因此，政府在治理这样一个刚爬出痛苦深淵的国家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无数紧急問題，不仅压力很大，而且发生在最不容易解决的時刻。

首先，为了正常行使中央政权，政府必須能够了解情况，下达各項命令并監督其执行。但是，在若干星期以內，首都和各省之間还不能有正常的联系。无数的电报和電話綫路被切断了，无綫电台被破坏了。在弹痕斑斑的飞机場上看不到法国的聯絡机。铁路几乎全部不能使用。我国的一万二千台機車只剩下二千八百台。从巴黎开出的火車，沒有一列能到达里昂、馬賽、土魯斯、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錫；沒有一列能跨过訥韦尔至大西洋的罗亚尔河、蒙特至英吉利海峡的塞納河，或者跨过里昂至地中海的罗尼河。公路桥梁有三千多座被炸毀；过去我們有三百万辆汽車，而現在只有三十万辆勉强能使用；而且，由于汽油奇缺，乘坐汽車簡直成了最不

可靠的事。至少还要等两个月才能正常地传递命令和报告。由于沒有正常的传递系統，政府只能断断续續地行使职权。

另一方面，交通的中断还打乱了供应計劃。而粮食、原料、燃料和工业品的貯存又都完全耗尽。不錯，阿尔及尔和华盛顿之間簽訂的“六月計劃”是規定要輸入第一批美国物資的。但是，我国的港口都不能使用，又如何实现这项計劃呢？一方面，敦刻尔克、布勒斯特、罗利翁、圣納泽尔、拉罗舍耳以及波尔多的海口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另一方面，加来、布洛涅、第厄普、卢昂、勒阿弗尔、瑟堡、南特、馬賽和土伦，由于英美空軍的轰炸和德国占領軍在繳械以前的彻底破坏，現在都只剩下坍塌的碼頭，破烂的船塢，閉死的水閘，被漂浮物堵塞的航道。

是的，盟国正积极供給我国在卢昂—里尔—布魯塞尔和馬賽—里昂—南錫两条战略軸綫上修复公路和铁路所需的工具；积极帮助我国在北部、东部和巴黎附近修复飞机場；从哥坦丁到洛林的輸油管很快就要敷設；他們在建成阿罗曼什和海滨圣劳伦人造港以后，正加速占領布勒斯特，排除进入瑟堡、勒阿弗尔和馬賽的障碍，以便在我国沿海卸下足够数量的物資。但是，运行的火車和卡車、着陆的飞机和碇泊的船只，主要都是供作战部队用的。甚至根据盟軍司令部的紧急要求，我們还要把煤場中的一部分存煤供給它，答应它运用我們的能够开工的某些工厂，并且把我們仅有的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供給他們。因此可以想像，全国的解放并不会首先給我們这个支离破碎、被洗劫一空的国家带来任何物质上的方便。

但是，解放至少使全国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件渴望已久的事情現在好像突然从天而降了！四年来，群众在敌人占領的压迫下，一直保持的沉默心理驟然消失了！現在是什么景象呢？人們可以彻夜高談，自由拜訪，随便来往！每个人不仅欣喜若狂，而且看到

自己面前展現出原来連想都不敢想的美景。但是，法国人民却像重病刚好就认为健康已經完全恢复的人一样，一味纵情欢乐，似乎一切困难都已經过去了。这是一种只图目前安逸的反常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把精神寄托到种种幻想上，以致必然产生很多誤解。

由此可見，很多法国人把解放和战争結束混淆起来。他們把在敌人被打垮以前應該进行的战斗、承担的損失、忍受的限制都看作沒有意义的令人討厭的事情。由于未能正确估計我国遭受破坏的程度，我国极端貧困的处境，以及我国所承担的繼續作战的繁重工作，因此他們认为，不要很久我国的生产就会大量恢复，供应就会改善，新的舒适生活的各种因素也会随之而来。人們把盟国看作厄比納耳^①画像的样品，认为它有无穷无尽的資源，准备供給法国；人們还认为，盟国由于热爱法国才来解放它，并且希望它重新站在强国的行列中。至于对戴高乐，大家把他多少看成一个神話人物，认为戴高乐將軍是神奇解放的化身，他一个人可以作出人們所希望的种种奇迹。

至于我个人，在风云变幻的夏末来到了悲慘的巴黎，我絕對不能自己欺騙自己。我看到人們的口粮像度荒年一样，衣衫襤褸，涼鍋冷灶，沒有灯火；我曾在櫥窗空空的商店、停工的工厂、死气沉沉的車站前面走过；我听到群众发的牢騷和团体提出的要求以及造謠惑众分子的兴风作浪；我清楚地看到，尽管各国人民都同情我們，但是各国都奉行一条铁的紀律：决不白白地贈送东西。所以，我們只有付出代价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我估計了为爭取我們那一份胜利和完成初步恢复工作所应付出的代价。考虑到这一切以后，我决不能用任何幻想来麻痹自己，我个人更沒有任何法术使全

① 厄比納耳(Epinal)，法国东部城市，以画像著称。——譯者

国不受痛苦就达到目的。但是，我一定要利用法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来拯救法国。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建立政权，把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团结在我的周围，把来自法兰西帝国各地的军队和内地军组成一支真正统一的军队，使全国重新开始生活和劳动，以免陷入可能引起的其他不幸的动荡之中。

必须自上而下地使政府全面着手工作。阿尔及尔的“委员们”，无论从“自由法国”时期就追随我的，或者以后在北非和我合作的，大部分仍将留在巴黎担任部长。但是，各方面的情况提醒我，应该把留在内地的、献身于抵抗运动的其他人物吸收到政府里来。不过政府还不能立即进行改组，因为在职的部长们只能从阿尔及尔陆续回来。在他们中间，迪特尔姆、雅基诺、达斯迪埃、菲利普四个人视察了第一军所属部队和南方各省。马西格里在巴黎解放时又返回伦敦，以便顺利地保持我国同外国的关系。普利文已经来到我身边。其他的人都要迟些时候才能动身。至于我从本土遴选的几个人，他们都刚刚离开地下活动，还不能马上来到巴黎。因此，到9月9日，也就是在我到圣多明尼克路以后过了两个星期，政府才重新组织起来。

政府中设两个国务部长，由詹伦内议长和贾德鲁将军分别担任。前者是从还有敌人盘踞的上索恩省邀来的，他的任务是草拟共和国政权逐步恢复正常状态所应采取的措施；后者将仍然同时负责穆斯林和阿尔及利亚总督府的事务。弗朗索瓦·德·孟顿继续任司法部长，安德烈·迪特尔姆任陆军部长，路易·雅基诺任海军部长，勒内·普利文任海外领地部长，勒内·麦耶任运输与公共工程部长，勒内·加比当任国民教育部长，保罗·吉亚哥比任粮食部长，亨利·弗莱乃任俘虏、迫迁人员与难民事务部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部由孟戴斯—弗朗斯负责，内政部由阿德里安·蒂克西尔负责，公共卫生部由弗朗索瓦·皮佑负责。有八个部由

从事过斗争的人负责；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财政部长安德烈·雷貝尔克，空军部长夏尔·狄戎，工业生产部长罗伯特·拉戈斯特，农业部长弗朗索瓦·唐吉-普利让，劳工部长亚历山大·巴罗迪，邮电部长奥古斯丁·劳伦，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戴让。

另一方面，有八名阿尔及尔的民族委员不再参加民族委员会：亨利·葛义是自动请求脱离民族委员会的；勒内·马西格里将代替7月间因劳瘁逝世的维埃诺担任我国驻伦敦代表；亨利·龐奈将任我国驻华盛顿的大使（美国已经同意）；安德烈·勒·特劳盖已就任巴黎市议会主席；厄曼努尔·达斯迪埃，因为我不允许他玩弄政治手腕而拒绝了我交给他担任的外交职务；安德烈·菲利普性情暴躁，不适宜担任行政工作，所以免除了他的国务委员职务；费尔南·格列尼埃同样失去了这个职位，因为在维科尔战役时，他的党玩弄阴谋，使他在阿尔及尔公开采取与政府对立的态度（虽然他以后对此有所悔悟）；让·蒙内任驻美经济谈判代表，自然不能在国民经济部成立之后再兼任国民经济部长。

我周围的二十一位部长起初感到工作漫无边际，无从着手。的确，确定一个目标仍然是非常必要的。1940年6月以来，我领导法国的目的是求解放，解放的手段是抗战。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要求全国上下一致，共同努力。

9月12日，在沙约宫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国抵抗委员会、各运动组织和通讯组织的领导委员会、市议会、国家团体、主要官员、巴黎大学以及经济界、工会、新闻界和律师公会的代表等，共计八千多人。这次大会给了我发表施政方针的机会。我在人人都沉醉于幻想的时刻，完全按照我的看法把事实摆开了。

我在追述全国掀起来的“欢乐、骄傲和希望的浪潮”并向抵抗运动、盟国和法国军队致敬以后，便着重说明应当克服的困难以及

必須进行的努力。不容許有任何貪图安逸、散漫松懈的情况存在！不容許有脱离政府、妄图干涉司法和行政的任何組織存在！我提出了不容易解决的“民兵”問題。我大声疾呼：“我們还在作战！”“在目前和以后的战役中，我們一定要尽可能参加。将来在占領德国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为此，我国需要建立智勇兼备、战无不胜的大部队，参加內地軍的热血青年将要并入这支軍隊……所有法国士兵都是法国軍隊整体中的一部分，他們應該像法兰西一样，永远是团結一致和不可分割的。”

在提到我国对外关系問題时，我也沒有忘記強調困难，而不管那些只会幻想不会考虑的人受到什么打击。我說：“我們完全相信，法国将来参加处理战后問題的权利終将得到承认，法国在对外事务中遭到的那种公然排斥，也将以恢复我国几世紀以来和其他大国一向保持着的正常来往而告結束……我們相信，在安排德国命运的时候，如果沒有法国参加，那就不能討論或通过任何决定，这关系着人类的最高利益……我們认为，在决定任何有关欧洲的問題时，如果沒有法国参加，那都是一种严重的錯誤……我們认为，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問題，如果沒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因为無論怎么說，在世界五大洲，有一亿忠实的人生活在我們的旗帜下……人类的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沒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

决不是只恢复自己的地位就算万事大吉，还必须能够保持住这种地位。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件事情，决不会沒有困难、不費力气就能实现。在描述我国所遭受的破坏和說明阻碍我国复兴的条件的时候，我宣布：“我們正处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解放决不容許我們有任何享受；相反，它意味着我們要繼續过苦日子，并且要求我們进行艰巨的劳动，服从严格的組織和紀律。”我补充說，“为

此政府必須作出必要的規定。”接着，我明确了政府所規定的目标，我說：“設法使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上升而提高；通过征用或保管的方式把某些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活动直接交給国家管理；沒收投敌分子所拥有的罪恶财产；在生产和运输还不能滿足消費需要的时候，規定物价和监督交換……”

毫無疑問，這是一些因時制宜的措施，然而它也符合抵抗運動在抗戰時期夢寐以求的改革原則：“要求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國家巨大資源的經營和管理要有利於全體；永遠消滅贏利聯盟；總之，要使法蘭西的每個兒女都能安全而有尊嚴地生活、勞動和教養子女。”

在結束講話時，我向“參加抵抗運動的男女戰士”發出了呼喚：“你們是佩帶着洛林十字勳章的人，你們在爭取法國的榮譽和自由的戰鬥中是全國的先驅，你們今后的任務是把全國人民引向富強和偉大的道路。這樣，並且也只有這樣，法國才能獲得偉大的勝利。”

我這次講話並不是針對着未來提出一些意圖，而是提出各個利益集團和各人要立即採取的若干措施。昨天，在倫敦或非洲，那還是將來要做的事情，而今天在巴黎，却是立即行動的問題了。有一種神祕的力量曾經鼓舞過自由法國的熱情。阿爾及爾委員會的計劃草案必然也是一種神祕的圖畫。可是現在，是政治支配政府的行動了。領導人今後所擺不脫的那些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現實，是不是會把野心家和集團分裂成各行其是的派別呢？通過抵抗運動而終於實現的團結意識，在拯救民族以後是不是還能保持獨立呢？沙約宮集會給我的印象，使我对這一點感到懷疑。

是的，在我走進會場就座時，在喬治·皮杜爾簡短而堅決的致詞以後我發表演說時，我的確是大家高聲贊頌的對象。當我只聽到歡呼萬歲的時候，我曾以為又回到了亞培爾大廳和布拉柴維爾

團結一致的會場，仿佛又走进了阿尔及尔、突尼斯、阿耶佐的那种有和我心情相同的听众的會場^①。但是，我說不出这里的热情欢呼含有怎样一种不和諧的音調，那种掌声的配合、与会者的互递眼色和点头示意，以及随着我的发言而流露出来的表情，使我感觉到，無論新的或老的“政治家”的称贊都各有其微妙之处。在这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行动将会由于一些保留态度和一些条件而复杂起来。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依靠企图在我与群众之間制造障碍的“社会名流”。我的威望是解决危难中难免要发生的分歧的資本。我應該像在巴黎一样，首先利用这种威望来建立各省的国家权力机关。

但是，很多省传来的消息都显示出普遍的混乱。毫無疑問，事先任命的共和国委員和省长都已在各地就职。他們最大的难题是使一切恢复正常。四年来人們的积憤太多了，郁結心中的这种憤怒，在敌人及其走狗树倒猢猻散的时候是必然要爆发出来的。有很多抵抗运动中的人要亲手处理問題和肅奸。游击队出身的武装部队，不通过法律手續就随意制裁曾經迫害过他們的人。在不少地方，公憤发展成为粗暴的反抗。这里面当然也有趁火打劫的政治阴谋、职业竞争、私报冤仇等行为。总之，非法逮捕、任意罰款和不經审讯立即处死等情况，使由于普遍穷困而产生的混乱越来越严重了。

由于缺乏警察的协助，地方当局在掌握当地情况方面也有很多困难。这种局面，即使机动卫队和宪兵的編制是滿額的，即使他們都有信心，也未必完全应付得了。何况他們不仅由于很多人当了游击队而人数大大减少，还因为他們都替維希政权效过力而感到

^① 这里指的是戴高乐过去受到热烈欢迎的一些地方，本书第二卷中曾經提到。——譯者

心虛不安呢！只有正規軍駐扎过的地方，如諾曼底、普罗溫斯、巴黎和罗尼河、索恩河、杜布河沿岸等地，才算阻止了絕大部分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凡是正規部队沒有进入的地区，共和国委員和省长就无力維持秩序。当然，我本来可以把非洲来的軍隊分派到内地去帮助他們，可是那就要减少法国的作战部队，从而影响我軍参加爭取胜利的事业。我宁肯冒险多少发生一些騷乱，也不肯放弃这种損失严重的权利。

老实說，如果共产党不像在巴黎那样企图乘乱夺取各省政权，这种危險是可以减少的。虽然政府明令規定每省只成立一个有各运动、各党派和工会的代表参加的解放委员会，临时协助省长工作，可是在地方上、在企业中、在公共机构和行政机关里却出現了很多委员会，企图对市长、資本家和經理施加压力并进行监督，搜查有罪和可疑的分子。狡猾而团結一致的共产党人，善于利用各种各样的招牌，依靠很多党員在斗争中博得的各阶层的同情和好感，不断挑撥和煽动有武装部队支持的組織。軍事行动小組委员会（COMAC）在政府机构和抵抗委员会之間玩弄两面手法，繼續在暗中分配任务，发号施令，授与軍級。我当时决定立即到事态最严重的一些地方去，以便使事务朝着适当的方向发展。我一連奔走了两个月，同很多省取得了联系，在这期間还抽空返回巴黎指导政府的工作。

9月14日，我在机庫被毀、遍地碎铁的布隆机場着陆。陪同我前往的有陆軍部长安德烈·迪特尔姆。十天前，法国第一軍和美軍解放了里昂市。这个城市当时正在努力恢复中。这的确是一个困难問題。里昂索恩河和罗尼河的桥梁，除石人桥完好如初，吉約蒂埃尔桥尚能通行人以外，其余的桥全被破坏了。威茲、布洛托、貝拉什等車站，以及作为該市主要交通的铁路，都已不能使用。各工业区，尤其是維呂尔榜工业区，七零八落的工厂触目皆是。但

是，和这些废墟景象不同的是，居民的热情却很高。

曾在这个地区做过抵抗运动领袖、最近又获得声誉的共和国委员伊夫·法奇，把工作安排得很好。他做事有热情，富于想像力，他能主动适应革命的形势，而从未采取过过激的手段。我曾命令他不要允许其他人采取过激手段。除此以外，通过沿途各阶层对我的欢呼，通过在省政府接见由省长隆尚彭介绍给我的官员和团体，在市政府接见“临时”市长儒斯坦·戈达尔（他对我说，他“正期待爱德华·赫里欧回来”）和市议会议员、基尔利埃红衣主教以及工商界、工会、自由职业及手工业的代表，我看得出来，从总的方面说，里昂人是绝对不想扰乱国家生活的。人们对于某些变化感到满意却又有相当的保留，对于某些惩罚认为必办却又觉得不够恰当，但是，他们毕竟希望平安相处。

第二天，我检阅了内地军。在游击战中和不久前在收复里昂的战役中都表现十分突出的德斯古尔上校，现在指挥这个军区。他率领那些神情激动、意气风发的军队在我面前进行了分列式。他们的样子虽然不很调和，但尽量采取了正规部队的形式，看来令人十分感动。法国军队的传统浸透在这支自动建立起来的军队中。我离开里昂时确信，只要政府着手管理，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并且认为可以对这里的秩序抱乐观态度，因为一个领导全国政府又出现了。

但是，马赛的气氛却十分沉重。我在迪特尔姆、雅基诺、皮佑三个部长陪同下于15日上午抵达那里。旧港区在1943年已被德国人破坏，后来盟军的轰炸和最后8月的战役，又把该市广大城区完全毁灭了，把船坞和堤岸也完全破坏了。此外，这里的海湾尽是水雷，码头倒塌，所有的起重工具都被敌人彻底破坏了。美国人希望利用这个基地，毫无疑问，社会服务机关是会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进行清理的。但是，由于破坏情况十分严重，不免使人怀疑是否要

等很久以后才能恢复。居民的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正过着悲惨的生活。此外，馬賽的上空还籠罩着一层由越軌行为造成的紧张气氛，也可以說是压力。是的，共产党人利用过去的地方区划，借口維希分子所进行的瘋狂迫害，竟在馬賽建立了一种无其名而有其实的独裁政权。这个独裁政权濫施逮捕，由于国家当局未予严厉制止，甚至还任意处死。

在这里，曾經在抵抗运动中很卖气力的共和国委員雷蒙·奥勃拉克，現在却缺乏高級官員应有的心理。在他本人、該地区各省长及其同僚都聚集到省政府的时候，我以适当的口吻向他們指出，政府希望他們恪尽职守，希望他們以后必須执行法律和命令。一句話，他們應該負起行政的責任，必須把所有第三种势力排除出去。我在检閱內地軍时，奖励了它們支援孟薩伯尔軍队收复馬賽的英勇行动。很容易看出哪些部队(占絕大多数)希望到阿尔薩斯去参加战斗，哪些暗中受人指使的小股部队願意留在当地。我当时命令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調来指揮馬賽軍区的沙德伯克·德·拉法拉德將軍，要尽快地滿足前者的願望，而将后者解散。同时命令陸軍部长立即从阿尔及利亚調一个团到馬賽来，以便推动事态的进展。

我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像在这座破坏惨重、情况混乱的大城市里这样感觉到，只有抵抗运动才能决定法兰西的新生，可是，如果分不清什么是解放和騷乱，那么，这种美好的願望势必成为泡影。此外，在馬賽进行調解的这个行政当局对我个人表示的坚定态度，是十分令人滿意的。必須說明，由于戴高乐將軍同聚集在穆伊广场和圣菲勒奥街上的群众談話，由于他在加內彼厄尔大街散步和在市政府受到加斯頓·德費尔市长欢迎，才掀起了群众拥护的浪潮，因而使得問題从表面上看来簡單化了。的确，从那以后，問題也确实变得簡單了。

下午，我很快地飞到了土伦。最令人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兵工厂、喀琅施塔得码头和附近市区所遭受的彻底破坏的情景，以及被毁坏的船只漂浮在港湾或船塢中的惨象了。但是另一方面，恐怕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舰队整整齐齐在海面摆开等待检阅的阵容更令人兴奋的了。被检阅的舰队分成三部分，分别由海军将军奥波诺和吉雅尔以及海军上校朗斯劳指挥。舰队包括：主力舰《洛林》号，巡洋舰《乔治·莱革》号、《杜盖—特鲁安》号、《爱米尔·伯尔坦》号、《让·德阿克》号、《蒙卡尔穆》号、《光荣》号，轻巡洋舰《芳塔斯克》号、《马兰》号、《恐怖》号，以及三十多艘鱼雷艇、潜水艇护航舰、扫雷船。我在海军部长路易·雅基诺、海军参谋长兼海军司令勒莫尼埃、港口司令朗伯尔海军将军等人陪同下登上了《皮克》号护航舰，慢慢地沿着舰队的行列向前驶进。当我从飘扬着大幅海军军旗的四十艘军舰前面经过，接受甲板上的参谋部人员对我的敬礼，听到排列在船舷上的水兵高呼万岁的声音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国的海军熬过了自己的痛苦，恢复了希望。

9月16日，我来到相当动荡的土鲁斯市，西南部的分裂一向最为严重。维希政权的政治和淪陷时期的悲惨生活更激怒了这里的人。况且，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很多，曾经进行过十分艰苦的斗争，因此，有很多人怀有深仇大恨，要求申雪。此外，在阿奎塔尼作过战的敌军，其行动特别残酷，必然也有不少卑鄙可耻的通敌行为。内地军的精锐部队已经开往布尔戈尼编入第一军，留在当地的只是一些杂牌部队。最后，这里紧靠西班牙，情况特别紧张，因为有很多西班牙人从内战时期就逃到惹尔、阿里埃日、上加伦等省，也参加了游击队。现在他们扬言要脱离游击队，携带武器返回本国。占居优势地位、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人，自然要火上加油，制造混乱，以便操纵全局。他们确也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我看到那里的共和国委员受着内地军某些领导人的箝制。那